

加勒比英语文学与本土语言意识

张 德 明

(浙江大学 中文系 ,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 要] 在“ 帝国主义文本化 ”的过程中 ,语言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帝国主义对殖民地语言的控制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和教育体制得到保证和强化。加勒比英语作家在经历了对西方文学经典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之后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 舌头”(语言) ,通过克里奥尔语整合了该地区异质性的文化 ,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加勒比作家做出的努力和尝试 ,对于处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当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加勒比英语文学 ; 本土语言意识 ; 克里奥尔语 ; 民族语言 ; 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 I109.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942X(2005) 03 - 0078 - 07

自从 20 世纪 60 年代理查德·罗蒂提出“ 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 ,语言问题在 20 世纪西方文学和批评中逐渐占据了中心地位。索绪尔和巴特、德里达和拉康成了当代学人必谈的对象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成了 20 世纪的热门学科 ;“ 解构 ”、“ 非中心化 ”、“ 表述危机 ”等关键词在学术期刊上频频出现。但语言不仅是人类的家园 ,也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表征。西方学术界提出的语言问题并不完全就是人类的语言问题 ,而表述危机也并非就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特有的现象。事实上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 ,在广大的属于第三世界的后殖民社会及后殖民文学中 ,有着一系列另类的“ 语言学转向 ”问题 ,它们虽与西方的“ 语言学转向 ”有某种相似之处 ,但却源自本民族文化面临的当下的问题性 ,既具有自身的文化价值 ,又对处于西方强势语言与文化压力下的第三世界当代民族文化的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即以国内学术界关注相对较少的加勒比英语文学为典型例证 ,讨论后殖民文学、本土语言意识与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一、帝国·语言·霸权

加勒比后殖民文学中语言问题的由来正如后殖民理论本身一样 ,建立在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欧地区征服和殖民这个“ 历史事实 ”上^{[1] (p.2)}。从全球体系来看 ,加勒比地区是近代以来两个世界(西方与东方)、两个大陆(旧大陆和新大陆)、三个大洲(欧、非、亚)和四个殖民帝国(英、法、西、荷)激烈冲撞的地区。它是最早的世界性移民地区之一 ,是多种不同的种族、语言、宗教和文化传统杂交和融合的十字路口。由于加勒比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自然条件 ,自新大陆发现以来 ,它就成为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殖民、控制、掠夺和争夺的对象。西方殖民者进入加勒比地区后 ,本土的原

[收稿日期] 2004 - 09 - 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 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3BWW006)

[作者简介] 张德明(1954 -) ,男 ,浙江绍兴人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

住民——阿拉瓦克人(Arawaks)和加勒比人(Caribs)几乎被消灭殆尽,大批来自非洲的奴隶被强行迁入甘蔗种植园;在奴隶制废除后,来自亚洲(主要是印度)的契约劳工又被大量输入加勒比地区,形成该地区种族、语言、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和混合杂交性。

按照后殖民批评的观点,帝国主义的霸权一方面是通过军事冲突、民族迁移和对财富的探求等强力得以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文化表征”(cultural representation)的过程。“对一块领土或一个国家的控制,不仅是个行使政治或经济的权力问题,它还是一个掌握想像的领导权的问题。”^{[2] (p.6)}帝国主义是通过无以数计的文化形式,通过文化象征层面上的炫耀和展示,才得到肯定、认可和合法化的。在“帝国主义文本化”的过程中,语言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西班牙卡斯蒂尔女王伊莎贝拉就直白地说:“语言是帝国最完美的工具”^{[3] (p.125)}。伊比利亚语文学家佩拉约(Macelino Menendez Y Pelayo)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看到了语言与帝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他将古典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视为具有特权的语言,认为这些语言“从它们由以生长的地方穿过广阔的地域,扩展了帝国的版图”。他并且将西班牙语和英语在美洲的扩张与拉丁语和希腊语在古典时代的扩张作了比较,在他看来,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反映了“西班牙人的天才”,并从“我们至今仍然在控制世界事务上占有二等地位”这个事实中引申出一种帝国的安慰^{[3] (p.125)}。

宣扬西方语言优势论是帝国主义从心理上征服殖民地人民的重要文化策略之一。以欧洲标准来衡量,被殖民者的语言不是“糟糕的”(bad),就是“破碎的”(broken)。至于文学则更是白人的特权。早在18世纪,康德就认为黑人和白人在心智能力方面的差异,就像他们之间在肤色上的差异一样大;在黑格尔看来,非洲人之所以沦为次等人种,就是因为他们缺乏“写作和感知系统,不能掌握欧洲语言中的那种写作艺术”;英国的麦考莱勋爵宣称:“一个标准的欧洲图书馆中的一个书架就比所有印度和阿拉伯文学更有价值”^{[3] (p.126)}。《人性论》的作者、英国哲学家大卫·休姆则相信:“黑人,以及一般地说其他种族的人……肯定低于白人”,当他听说有一位牙买加黑人表现出文学才能时,不以为然地说:“那充其量不过像一只鹦鹉学舌,能发几个清晰的音罢了”^{[3] (p.125)}。

在帝国主义向加勒比地区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欧洲语言优势论得以物质化和体制化,变成一系列可实际操作的行政管理和文化教育制度。为了控制殖民地人民的思想 and 言论,消解其反抗意识,抹杀其民族记忆,殖民主义者将来自同一地区、操同一语言的非洲奴隶分为不同的小组,将欧洲语言强行植入奴隶的语言中。尽管奴隶在种植园中还是经常说非洲语言,但在欧洲人占统治地位的西印度社会,它们被系统地打了折扣(discounted),至少在官方场合已经被欧洲语言、文化和历史所取代了^{[4] (p.19)}。与此同时,殖民主义者还在殖民地强行推广西式教育,将西方文学经典文本输入西印度社会。许多加勒比英语作家回忆,他们就是在背诵华兹华斯的《咏水仙》或阅读狄更斯的长篇小说中度过他们的少年时代的,尽管西印度群岛既没有水仙花,也没有伦敦雾。

长此以往,殖民地人民的话语权和自我阐述权就被西方殖民者剥夺了。甚至殖民社会的历史也只能通过欧洲人之口被叙述出来。V.S.奈保尔通过其小说《河湾》中的主角萨林姆说的一番话,道出了殖民主义语言霸权与殖民地人民普遍的表述危机之间的联系:

我自己的家以及印度洋的历史我都是从欧洲人写的书上了解到的。我可以说我们阿拉伯人当年是伟大的冒险家和作家,我们的水手在地中海上张起三角帆,为后来发现美洲大陆作了铺垫;我可以说印度导航员带着达·伽马从东非航行到加尔各答,我也可以说“支票”一词最早的使用者就是我们波斯的商人——之所以能说出这些,都是因为我看过欧洲人写的书。但这一切都不在我们自己的知识范围内,也不能引发我们的自豪感。我觉得如果没有了欧洲人,我们的过去就会被冲刷掉,就好像镇外那片沙滩上渔人的印迹一样。^{[5] (p.12)}

二、模仿·失语·诅咒

加勒比英语作家的文学创作始于对西方文学经典的模仿。在英式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作家们普遍认为,只有用标准英语写就、亦步亦趋模仿西方文学程式结构的作品才算得上是文学,才能被西方宗主国的读者所接受。当代巴巴多斯诗人、作家卡莫·布莱斯维特(Kamau Brathwaite)指出,在殖民文化教育体制下出现的怪事就是,人们对英国国王和女王的了解比对自己本民族的英雄知道得还要多。人们不去描写加勒比地区每年发生的飓风,而去描写根本没有见过的下雪的经验,甚至写出“雪落在甘蔗田里”这样可笑的诗句^{[6] pp.263-264}。

20世纪30年代,加勒比英语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一些作家,如牙买加的雷德凯姆(Tom Redcam)的创作混合了对不列颠的“忠诚”和对牙买加的“爱”,反映了“政治归属”和“情感归属”之间的矛盾,显示出一种朦胧的本土意识^{[7] p.35}。另一些作家则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经验和用以描述经验的工具——语言之间发生了脱节和断裂,殖民地的本土经验无法用一种强行输入的外来语表现出来。V.S.奈保尔在《茉莉花》一文中回忆道:

一位老夫人折了一枝花给我。我将它缀在衬衫扣眼中。我在回饭店的路上边走边嗅着它。茉莉花,茉莉花。但是词语和花之间在我心中是脱节的。它们不能同时出现。^{[8] p.3}

奈保尔熟悉茉莉花的气味,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因为那属于另一个语境:茉莉花是书本上的一个词,是从枯燥的植物学中引出来的一个词。正如当代加勒比评论家威斯(Timothy F. Weiss)指出的:“(茉莉花)这种植物生长在西印度群岛,它的名字却属于他(V.S.奈保尔)所受的英国式教育和他的浪漫的文学野心的一部分。对V.S.奈保尔来说,花与词语之间的脱节实际上标示了殖民地世界与具有‘蒸馏’、‘歪曲’之权力的英语之间的鸿沟,标示了被大西洋分割的群岛之间的距离,以及他的殖民身份与他想成为都市作家的渴望之间的距离。‘同时也体现了’给予意义的帝国中心的权威与V.S.奈保尔的殖民经验和理解之间的鸿沟^{[8] pp.3-4}。

当代加勒比女诗人格莱斯·尼古拉斯(Grace Nichols)的一首经常被人引用的诗表达了后殖民作家普遍的“失语症”。“我越过了大洋/我失去了我的舌头/从那古老的根上/一种新的根已经生长。^{[9] p.131}在这首短诗中,诗人有意利用英语中舌头和语言(tongue)的双关性,暗示了失语给殖民地作家造成的心理以及生理上的痛苦,因为语言与生存之根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的失去意味着后者的断裂,族群的记忆在民族大流散(diaspora)中迸裂为碎片。

如何在殖民者强行植入的欧洲语言和本土语言中进行选择,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语言)和介入世界文化主流之间保持平衡,成为加勒比后殖民作家不得不关注的核心问题。沃尔科特在《绿夜》(1962)中的诗句道出了后殖民作家面临的语言困境:“我怎能作出选择/在我所爱的这个非洲和英语之间/是对两者都背叛/还是把它们给与的统统归还?”许多加勒比作家将莎士比亚《暴风雨》中普罗斯佩罗(Prospero)与卡列班(Caliban)的关系解读为殖民主义者与原住民的关系:普罗斯佩罗从米兰来到荒岛,征服了原住民卡列班,并且教会他说欧洲语言,只是为了控制他,使唤他。而被外来者强占了荒岛并沦为奴隶的卡列班的反抗则是:“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的好处就是懂得了怎么样诅咒。^{[10] p.529}事实上后殖民作家正是在学习西方殖民者提供的语言和经典的同时,学会了用后者的方式进行“诅咒”。布莱斯维特宣称:“如果说普罗斯佩罗创造了语言的牢房将卡列班囚禁其中,那么卡列班的责任就是从中开出一条道路来。他能够开辟的惟一的道路就是返回他母亲,塞克罗克斯的语言。^{[8] p.188}一些作家有意识地运用所谓的“破碎的”语言作为反抗欧洲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和理性结构的工具。正如《加勒比文学读本》的编者阿利森·多奈尔(Alison Donnell)等人指出的:“在加勒比文学中,破碎性被视为语言实验的工具,文学的转喻,历史和经验的范式。^{[7] p.364}

加勒比诗人吉米·兰德在一首题为《敲门,敲门》(Noke-noke)的诗中有意运用了原始(primitive)的声音模式:“Me was fas a sleep in me bed/wen a nok come pun me door/bright and early for day morning/before dawn bruk/Nock nock-nock nock/badoombadoom nock nock/badoombadoom nock nock/badoombadoom nock Badoombadoom nock/Who dat ia who dat nock?”这首诗有意打破标准英语的规范,如将第一人称主语和所有格全写成宾语形式的“me”,似乎是在强调殖民地人民所处的宾格(从属)地位;为了强调口语效果,许多单词(如 bedroom、knock、break)有意被误拼或漏拼,等等。大卫·戴比迪(David Dabydeen)指出,上述这类诗歌在语言的运用上与黑人意识难解难分,殖民主义者强行推广欧洲语言的根本目的是要将“他者”经验殖民化,将之纳入自己的文学感觉范围内,以便更有效地实行殖民统治,而后殖民作家用活生生的黑人士语写活生生的本土题材,本身就是对英语经典的一种颠覆^{[7] p.412}。

种种事实说明:“对于后殖民话语来说,语言是基本的斗争场所,因为殖民的过程本身是从语言开始的^{[8] p.283}”。如果说当代西方解构主义思潮号召突破逻各斯中心“语言的牢房”,那么,对于后殖民作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突破殖民主义语言的牢房,建立起本土语言的文化地位。

三、克里奥尔语·民族语言·文化身份

法兰兹·法依在《白皮肤,黑面具》中指出,语言是建立加勒比身份的中心事件。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他发现外来语言在引发当地原住民的精神疾病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帝国主义的 language 对加勒比人民有着特殊的影响。在被殖民的非洲国家中,本土语言和外来的欧洲语言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冲突。黑人被要求说标准英语的同时,也贬低了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这种语言中,“黑鬼(nigger)一词既指体质性的,也指动物性的,而‘白人’一词则是道德性和智力性的^{[9] p.120}”。布莱斯维特指出:“正是在语言中,奴隶也许真正被其主人成功地奴役了,但也正是在使用(误用)这种语言的同时,他也许进行了最有效的反抗。^{[9] p.120}”这种语言就是克里奥尔语。

克里奥尔语起源于18世纪末,是从加勒比种植园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的语言与文化现象。在种植园中,殖民主义者禁止奴隶说非洲土语,就像《暴风雨》中的普罗斯佩罗禁止卡列班说土语一样。为了生存和斗争,奴隶们需要发明一种既能允许他们对付殖民主子,又能在自己人中间进行交流的“潜语言(submerge language)。克里奥尔语就这样被发明出来了。法依认为,从殖民者语言中创造出来的克里奥尔语,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存在的方式”,因为“每一种方言都是一种思想方式^{[9] p.120}”。在克里奥尔语中,词语意义往往更多地依赖“能指”(音调的高低和节奏),而不仅仅是“所指”(抽象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克里奥尔语从整体上渗透了西印度社会。它为来自不同种族文化背景的奴隶之间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其形式也随着使用者的不同而变化。

克里奥尔语出现之初被殖民主义者视为一种“退化的英语”。但是,特立尼达的中学校长 J.J.托马斯早在1869年出版的《克里奥尔语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就指出,克里奥尔语不应被看作是退化的英语,而应被视为语言的进化,因为它有自己的语法、句法和词汇^{[9] p.120}。克里奥尔语为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语言资源。20世纪初,牙买加诗人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和路易斯·班内特(Louise Bennett)率先在文学中运用了克里奥尔语,为克里奥尔语独白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圣·路西亚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其1958年发表的系列十四行诗《群岛故事集》第5章的开头,成功地运用了经过改造的克里奥尔语,成为一个经常被人引用的例子。在小说方面,特立尼达小说家撒缪尔·塞尔文(Samuel Selvon)创作的《孤独的伦敦人》(1956),首次在整部小说中运用了克里奥尔语。一位评论家指出:“这是西印度文学中一位作家首次成功地将加勒比语言,包括它的精致和微妙的韵律带入书页,既不是作为奇珍异宝,也不是作为异国情调,而是如同阳光般的自然。

加勒比语言突然发现了它自己的叙述语言。^{[9] p.125}大卫·戴比迪(David Debydeen)说,克里奥尔语是“一种对标准英语的个人化的重组”,因为克里奥尔语是一种极富文学潜力的语言,它“能够表达其使用者全部的深层次经验^{[7] p.416}”。在他看来,现代的“卡列班正在撕破普罗斯佩罗的魔术书页,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的目的,以自己的顺序重新编排之^{[7] p.363}”。女作家荷洁(Merle Hodge)直接而动情地呼唤加勒比人运用克里奥尔语作为“增势(empowering)的工具:

我们说克里奥尔,我们需要克里奥尔,没有克里奥尔我们就不能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深层的思想过程限制在克里奥尔,可我们却轻视克里奥尔。^{[7] p.13}

尽管有不少作家和理论家从不同角度论述过克里奥尔问题,但对克里奥尔化作出明确解释,并将其与民族文化认同问题联系起来的,当归功于当代巴巴多斯诗人、小说家和理论家卡莫·布莱斯维特。1979年,布莱斯维特在哈佛大学的一次讲演中,率先亮出了“民族语言(nation language)的大旗,肯定了加勒比地区“非标准”方言土语的文化地位。在他看来,民族语言与方言土语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加勒比本土文化的核心就是克里奥尔化的语言与文化。按照布莱斯维特的说法,“克里奥尔化”是指对加勒比地区现存的四种文化携带者(美洲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及东印度人)之间相互作用及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并由此在新大陆创造出新社会的一种社会文化的描述和解释。克里奥尔语既是一种无力的语言(因为它没有官方地位),又是一种有力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强大的颠覆潜力)。运用克里奥尔语或民族语言,就是承认来自非洲的残存的口语传统的活力,承认充满地域色彩的本土民间文学,从而将碎片化的加勒比经验整合起来,达到文化身份认同^{[1] (pp.309-313)}。

按照布莱斯维特的总结,民族语言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口语性。在他看来,诗歌和文化本身不存在于词典中,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口语传统中,因此,必须强调声音模式在传达意义上所起到的作用。声音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的附加物,而是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失去了声音也就失去了一部分意义,因此,布莱斯维特强调诗歌的朗诵性,认为只有朗诵才能保留口语的鲜活生动性。其次,民族语言是一种整体的表达(total expression)。阅读是个人化的、与世隔绝的活动,而口语则依赖于观众的共同参与。诗人创造的声音需要听众作出反应,然后再回到诗人自身。因此,意义是一个全民共同创造的连续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全民的经验和情感融为一体,达到集体认同^{[6] pp.271-273}。不难看出,布莱斯维特的这种观点与当代美国黑山派诗歌主将奥尔森提出的“放射诗(projection poetry)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处在于,布莱斯维特主要是从建立民族文化诗学的角度出发考虑诗歌口语问题,奥尔森则更多地从诗歌语言实验的角度入手强调诗歌能量的放射问题,从根本上说,两者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诗歌形式实验上,布莱斯维特号召打破自乔叟时代以来的五音步抑扬格英诗格律传统,而代之以一种以口语为基础、适合于表现加勒比自然环境和经验的韵律节奏。加勒比具有非常丰富的民间口语文化传统,既有来自原住民美洲印第安人的,也有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口语文化传统。来自东非的奴隶和来自印度、中国的契约劳工们在踏上横渡大洋的帆船的同时,也把自己本民族的传统带上了加勒比群岛。在特立尼达,一直流行一种名叫卡里普索(calypso)的小调,诙谐幽默,音韵丰富,表现力强,如今已成为加勒比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加勒比英语作家们的这种尝试和努力与北美新大陆惠特曼对自由体诗(free verse)的追求出于同一目的,都是为了打破英诗传统的束缚,建立独立的民族诗学体系,同时也是反抗欧洲语言霸权,获得文化身份的一条重要途径。

但是,抵抗欧洲语言霸权并不意味着完全拒绝外来文化,而强调本土口语传统也并不意味着走上闭关自守的狭隘民族主义之路。正如阿契贝所说:“我觉得英语(English)可以携带我的非洲经验。但必须有一种新的小写的英语(englishes),与其古老的家园完全和谐,但改造成可以适应新的非洲语境。^{[1] p.286}”比尔·阿什克罗夫特(Bill Ashcroft)则认为,那种认为英语不能传达出非英语文化

意义的想法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即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其实,意义是在“信息事件”内部的互动中构成的,语言的挪用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颠覆的策略^[1](p.284)。他同时指出,后殖民社会的语言以复杂性、杂交性和持续的变化为其特征,它必然要拒绝殖民主义对语言或符号结构作出的“标准”和“变体”的区分。所有的语言都是边缘的,所有的语言都出自冲突和斗争^[1](p.300)。在种种关于语言的论争中,马莱·诺比斯·菲力普(Marlene Nourbese Philip)的话或许是较为现实和中肯的,体现了一种全球化时代应有的宽容。他认为:“说经验只能用标准英语表达(如果确实有这种东西),或只能用加勒比通俗口语表达(确实有这种东西),实际上是限制了用加勒比土语写作的非洲艺术家的经验。真正的经验恰恰存在于从标准英语到加勒比的表达的连续体(continuum)之中。”^[9](p.131)

四、结 论

从上述探讨中可以看出,加勒比地区就像所有的后殖民社会一样,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殖民主义势力撤出后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建立,而语言则是文化身份的核心。加勒比作家尽管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对西方经典的亦步亦趋的模仿过程,但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舌头”(语言),通过克里奥尔语整合了该地区异质性的文化,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中赢得了一席之地。加勒比作家以他们的行动证明:西印度的独立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变化,而且是用西印度词语表述西印度思想和感觉的一种更新的能力。^[4](p.101)

当代加勒比英语作家对本土语言意识和文化身份之间关系的探索 and 实验,对于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民族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在近代没有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全面的殖民入侵,按理说,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似乎是不成问题的。但必须看到,进入当代,尤其是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来自西方的强势语言正在日益侵蚀着汉民族语言的纯洁性。大量未经消化的外来词语进入汉语的词汇库,许多欧化的句子正在消解着传统汉语的语法结构,学术界早已有人提出汉语文学和学术的“失语”问题,而公众在语言文化心理方面的“自我殖民化”倾向似乎也越来越明显。如何正确看待和解决这些敏感的问题,既保持本土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又不至退回到闭关自守的老路,在这方面,研究一下当代加勒比后殖民文学和批评,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参 考 文 献]

- [1]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Helen Tiffin, *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 [2] 艾勒克·博埃默(盛宁译). 殖民与后殖民文学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 [3] Silvio Torres-Saillant, *Caribbean Poetics, toward an Aesthetic of West Indian Litera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4] J. Edward Chamberlin, *Come Back to Me My Language: Poetry and the West Indies* [M]. Nu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3.
- [5] V.S. 奈保尔(方柏林译). 河湾 [M].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2.
- [6] Kamau Brathwaite, *Roots* [M]. Michigan Cit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3.
- [7] Alison Donnell, Sarah Lawson Welsh, *The Routledge Reader In Caribbean Literature*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8] Timothy F. Weiss, *On the Margins, the Art of Exile in V.S. Naipau* [M]. Boston: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2.
- [9] Louis James, *Caribbe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M]. London And New York: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imited, 1999.

[10] 莎士比亚(方平译).新莎士比亚全集 第 3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徐 枫]

Anglophone-Caribbean Literature and Nativ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ZHANG De-m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Zhejiang University , Hangzhou 310028 , China*)

Abstract : Language , according to the view of post-colonial criticism , is a battle-field where competitors struggle for the power of discourse . In the process of "textualization of imperialism" languag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 Imperialists control the power of discourse by marginalizing native tongues and imposing the master 's language on the colonized society as a norm in relation to various "impure" dialects , these measures are strengthened and authorized by colonist political ,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gimes . Therefore , in order to subvert the imperialist power , the first task the post-colonial writers undertake is to escape from "the prison of language" built by colonists , to undermine the colonist linguistic-cultural systems , and to set up a cultural position for their own native language .

For Anglophone-Caribbean writers , the key problems are how to make a proper choice between the language imposed by imperialists and native tongues and how to keep a proper balance between using native languages and joining in the main stream of the world 's cultural and literature trend . Trying to find a right solution , Anglophone-Caribbean writers have gone through a difficult process : they imitated Western classics and their modes , suffered literary "aphasia" , were tortured by gaps between native experiences and alien expressions , and finally confirmed the creolized language and culture as the core of their region . The Creole language describes and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and reaction between various cultural element carriers-native (Indian) Americans , Europeans , Africans and Asians , shapes and reshapes a new society and culture in the Anglophone-Caribbean region . The use of Creole helps Caribbean writers to mix up oral tradition and living folklore , to unify fragmental Caribbean experience , to gain a cultural identity , and finally to win their own position with a unique voice in world literature . It seems that there is no problem between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China , a nation with a longstanding history and rich cultural tradition and haply not having been colonized by imperialism . It must be kept in mind , however , tha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global age , the powerful languages from the West , English in particular , are imposing their stamps on and corrod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 Numerous undigested foreign expressions flood in its vocabulary and social use . Europeanized syntax corrodes Chinese grammatical structure . The problem of cultural "aphasia" , according to some scholars , is also happening in China . A tendency of self-colonization among the public is becoming obvious . There is no easy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 yet it is essential to keep the characteristic features of our nation 's language and cultural tradition , on the one hand , and not to go back to the situation of national isolation , on the other . In this age when culture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 explorations and experiments of Anglophone-Caribbean writers and critics are of great interest to us both in practical and theoretical aspects .

Key words : Anglophone-Caribbean literature ; nativ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 Creole ; national language ; cultural identity